



工人区，用“顾正红是我们的亲兄弟，帝国主义不打倒，我们的苦就没个头”等朴素语言发动群众。在他指导下，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培养工运骨干的摇篮，仅1925年6月就发展党员183人，占同期上海新党员的55%。他提出的“把口号变成行动，把行动变成纪律”的动员原则，至今仍是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。

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忻平在分析五卅精神时指出，蔡和森的群众动员实践体现了“理论联系实际”的马克思主义学风，他将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工人群众可感知的斗争目标，这种“接地气”的工作方法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提供了实践样本。

刘少奇：创新治理工会保障工人生活

刘少奇1925年到上海时，正值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罢工，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正处于高潮。刘少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，为“五卅”反帝大示威四处奔波，做了大量的十分艰巨的组织和准备工作。上海总工会成立后，刘少奇被选举为总务科长，和李立三等人一起组织

和领导全市工人总罢工。他主持制定了《上海总工会组织条例》，建立“处—科—干事”三级架构，使25万罢工工人实现了有序管理。

因为罢工，资本家断绝了工人的工资来源，面对工人的实际困难，刘少奇推动成立救济委员会，短短两个月筹集100余万银元救济款，首创“按工龄发放补贴”“伤病工人特别救助”等制度，切实保障了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，为五卅运动能够坚持斗争长达三个多月之久，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。

刘少奇不仅往返各救济团体之间积极筹措募捐款，甚至深入到罢工工人家中，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。6月22日，刘少奇在得知岳州路经纬纺织厂女工急需救助后，便要求济安会派人一面发给该厂工人补助费，一面派人前往该厂工会调查确切人数。他还亲自把救济款发放给参加罢工的电车工人和英商厂的工人，解除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后顾之忧。

党史学者指出：“刘少奇的贡献在于将工会从‘抗议组织’转变为‘治理主体’，为中国工运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”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邹卫民在《上海总工会及其贡献启示》中分析，刘少奇的组织条例为后来苏区工会建设提供了范本，其救济机制直接影响了1931年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》的制定。

当反动派对总工会污蔑“贪污救济款”时，刘少奇还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。他主动邀请上海著名会计师徐永祚，对30余万笔捐款进行逐一审计，并在《申报》《民国日报》公布详细账目，附上审计报告全文。这一在当时堪称“破天荒”的举动，迅速平息了舆论质疑，树立了工会组织的公信力。

澎湃新闻报道显示，该事件被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记录为“中共首次成功运用现代审计手段化解危机”，间接反映了刘少奇的治理前瞻性。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，刘少奇的审计实践启发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后续的财务管理制度改革，这种“以斗争促进步”的效应成为五卅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隐性贡献。

潭子湾大丰纱厂。图片提供/中共一大纪念馆

